

今日长文 · AI时代的教育困境 · 之三

松动与硬化

论 AI 时代教育困境的自锁结构

王德生 著 · 德麦国际 · 二〇二六年

目 录

为什么"合法性危机"和"文化再生产"装不下当下	3
制度层:垄断瓦解,新墙矗立	4
观念层:成功叙事断裂,焦虑叙事填充	4
内心层:身份沙化,角色硬化	5
自锁结构:它为什么松不回去	5
面对最有力的反驳	6
谁在裂缝处冒险	6
一幅不工整、却更接近真实的地图	7

旧的结构在一端松动时,
新的、更坚硬的形态,
正在另一端同步生成。

一项覆盖全球十五个国家的教育调查显示,超过六成的受访教师表示"不确定自己在课堂上的核心价值是什么",而近半数中学生认为"学校里教的大部分东西,我在网上能学得更快更好"。这两个数字本身并不令人意外——任何在教育现场工作的人,都能感受到这种弥散在空气里的迷茫。真正需要被追问的,不是"这种迷茫有多普遍",而是"它是怎么来的,以及为什么它如此难以被驱散"。

主流的回应大致有三种。"技术适应论"说教育落后于技术,方案是加速教育的技术化;"人文守护论"说人被技术异化,方案是在教育中为技术划界、回归人的本质;"制度批判论"说问题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,方案是先改变社会再谈教育。这三种路径各自捕捉了一部分真相,却共享一个隐蔽的预设:它们都假设教育的根基依然稳固,只是需要调整、充实或净化。它们都没有追问:如果那些让学校成为学校、让教师成为教师的最基础条件,本身正在经历一种复杂的、不完全是"坍塌"的结构位移,那怎么办?

这就是本文要追问的问题。本文的核心判断是:AI 时代教育困境的本质,不是任何单一层面的"功能失调",而是一种**"松动与硬化同步发生"**的复杂运动。支撑教育运转的三重条件——制度层的知识垄断、观念层的"读书改变命运"叙事、内心层的"知识传授者"身份认同——正在同时经历旧结构的松解与新结构的硬化。这两个方向不是先后发生的,而是同一过程的两面。三层彼此联动,形成一个把各方行动者困在其中的**自锁结构**:每一方都看到了问题,但每一方的应对策略,都在客观上让结构变得更坚硬。

为什么"合法性危机"和"文化再生产"装不下当下

先对几种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传统作一次检讨——目的不是指出它们"忽略了什么",而是进入它们各自的逻辑内部,看它们推进到哪一步开始出现裂缝。技术适应论只把技术当工具,没看到技术是一种正在生成新结构的物质力量:当知识获取的渠道从学校转移到平台,谁控制算法、谁掌握数据,就成了新的权力中心——学校在"升级"中反而进一步丧失了对知识传递的控制权。人文守护论抓住了价值维度,但它自身的成立依赖某些特定历史条件(相对稳定、未被经济逻辑充分渗透的环境),当这些条件松动,人文理想不是被"驳倒",而是被"悬空"了。制度批判论——尤其是布迪厄的"文化再生产"——把困境锚定在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中,但它没能处理:**当文化资本的垄断地位本身被技术瓦解时,再生产机制如何继续运转?**本文的判断是:它在继续运转,但变了形——从"通过垄断知识传递来筛选",滑向了"通过认证竞赛来筛选"。

还有一种应当被正视的传统:哈贝马斯的"合法性危机"。按这套逻辑,教育困境是系统无法再从社会获得正当性认同——家长不再相信学校能给孩子好未来,学生不再相信眼前的学习有意义。这在描述层面成立,但它停在了"认同"层面。本文要追问的是:这种合法性危机,是从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变动中生长出来的?当知识稀缺性被瓦解,学校失去的不只是社会的"信任",而是一整套功能性

的存在理由。信任可以靠叙事重建,但如果功能基础本身已经不可逆地位移,叙事重建就只能是一种暂时的、脆弱的修补。这四种传统的共同盲区在于:它们都把困境当作某种"正在消逝"的状态——功能消逝、价值消逝、正当性消逝;而没有充分注意到,在这些"消逝"的另一端,新的、同样坚硬的东西正在生成。

制度层:垄断瓦解,新墙矗立

学校这种组织,从诞生第一天起就与知识的稀缺性牢牢绑定。生成式 AI 从两个层面同时动摇了这种稀缺性:一是"获取"的稀缺——任何有网络的人都能随时获得任何基础知识的、被良好组织过的讲解;二是更根本的"效率"稀缺——过去学校的价值在于"高效地、系统地传递知识",而一个拥有实体围墙、固定课表的学校,不是一个能全天候按需应答、无限重复、不限次追问的 AI 的对手。旧稀缺性在松动——这是可见的那一面。

但与此同时,新的稀缺性正在被制造。当知识获取的渠道从学校转移到平台,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:谁控制着这些渠道?一个学生用 AI 学习,背后是某个科技公司的模型——它用什么数据训练?它的"解释"有没有隐藏偏差?它"推荐"的学习路径基于什么算法?这些问题,学校无力回答,学生和家长更没有。学校曾经垄断"什么值得学"的界定权,现在这个权力正在向平台转移——但不是消失了,而是从一种可见的、可被公开讨论的制度性权力,变成一种不可见的、嵌在代码里的算法性权力。一种新的知识垄断正在生成:它不表现为"知识的稀缺",而表现为"知识获取渠道的集中控制"。旧垄断的松动与新垄断的硬化,是同一过程的两面。

观念层:成功叙事断裂,焦虑叙事填充

"学知识—考高分—上好大学—找好工作"这套叙事,不是从来就有的。它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被日常实践不断加固,强大到"不需要被证明":家长不需要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好好学习,答案不言自明。AI 对它的冲击,不在于"否定了前半段"——学习知识仍然重要——而在于让后半段变得高度不确定:当企业招聘越来越看重"能否用 AI 高效产出"而非"脑子里装了多少知识",那个曾经笃定的向上逻辑就暴露出了裂痕。这种断裂在尚未进入就业市场的学生身上,表现为一种更具侵蚀性的"目的悬置":眼前这道反复操练的题,AI 会做而且做得比我好;这篇要背的古文,拍张照就能全文翻译——那我究竟在为什么熬夜?断裂不是一瞬间的爆破,而是缓慢的锈蚀。

然而,叙事的断裂并不意味着"叙事需要"的消失。当旧的那套松动、而新的同样稳健的叙事尚未生成时,一种更简单、更直接、更暴力的叙事就挤进来填补空白——当下最典型的,就是"不学 AI 就被淘汰"的焦虑叙事。它在逻辑上是粗糙的,但在情感上是有效的,因为它直击了旧叙事断裂后留下的那个最原始的恐惧。取代"读书改变命运"这个向上逻辑的,是一种更原始的恐惧驱动——不是为了向上流动,而是为了"不掉下去"。旧叙事的松动和新叙事的硬化,在这里同步发生。而后者比

前者更脆弱、更耗竭——因为它是被恐惧驱动的,它能推动行动,却无法提供意义。当一个系统中所有人的动力都来自"不掉下去"而非"要上去",这个系统消耗的能量,远比它产出的大。

内心层:身份沙化,角色硬化

"知识传授者"作为教师的核心身份,是与其知识垄断地位共生的产物。AI 对这一认同的冲击,不是"教师会被取代"这种粗线条威胁,而是更隐蔽的东西:它替代的不是教师的全部工作,而是其中最具光环的那一部分——知识的解释者、纠偏者。一节数学课上,老师讲了二十分钟一道立体几何证明,下课后学生拿着手机走过来:"老师,这道题 AI 是这样做的,好像更简单,只要四步。"老师看了发现确实如此,只能勉强说一句"考试的时候你不能用手机"——这句话他自己都觉得心虚,因为学生反问的那句"可是高考以后我就可以用了",他无法回应。这些日常场景的累积,比大面积失业恐惧更具侵蚀力:它一点一点抽走他赖以确认自身价值的那层光晕。

当"非我不可"的信念开始动摇,而系统又不可能让教师"没有身份"地站在讲台上时,新的防御性角色就会硬化成型。最典型的两种,是"纪律管理者"和"情感安抚者"。在学业基础较差的学校,教师很快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讲解大部分学生听不进去,课堂的默认目标从"把知识讲透"移位到"把秩序管住"——一个老师一天中最有成就感的事,不是哪个学生弄懂了知识点,而是今天班上没有人打架。而"情感安抚者"角色的硬化,则表现为教师被推向学生心理健康的第一线,却没有被配备相应的专业支持:当一个学生在周记里写"我觉得活着没意思",班主任必须去谈话、去安抚,但她的心理学训练可能只有师范时的那两个学分。她做的是一件极重要又极专业的事,支撑她的却只有个人的人格力量——这种状态在长期中高度不稳定,要么彻底退出,要么在反复被耗尽后变得麻木。旧的"知识传授者"身份在松动,新的防御性角色在硬化——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教师内心景观的当前形态:不是单一的"沙化",而是旧的已不稳固、新的同样无法安放自我的流沙地带。

自锁结构:它为什么松不回去

三层不是并列的,而是一套彼此咬合、互为因果的联动结构。某市某初中去年做了一次"教学改革":期末成绩不再公布具体分数,改为等级制(A/B/C/D),目的是"减轻学生的分数焦虑"。这在制度层是一个微小调整,但它在观念层激起的反应,远比设计者预想的复杂。一个初二女生回家说"我数学得了 B",妈妈的第一反应是"B 相当于多少分?"女孩说不知道。班级群里已经炸了锅:有家长在推算"B 是不是以前的 80 分段",有家长直接打电话要原始分。等级制原本想松动的分数焦虑,非但没松动,反而因为"不透明"而加剧了——以前知道分数,至少知道离目标差多少;现在脑子里想象的空间,比现实更可怕。一周后的家长会上,班主任李老师被追问了三小时,一个爸爸临走丢下一句:"老师,你说的这些我都懂,但我不关心他全面发展,我只关心他能不能考上高中。"李老师回家后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——不是被驳倒了,而是脸对脸撞上了另一个世界,然后她的世界退了一步。从那以后,她备课不再那么绞尽脑汁——反正考核只看平均分,把题型讲透就够了。一个学期后,教

导处发现她的教案比以前更"规范"了,却隐约感到"教案好看了,课好像没什么变化"。而他无法用"李老师上课更有灵魂了"去填考核表——那个评价系统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格子。

到这里,必须把一个容易被误认的东西说清楚。人们习惯把这类现象叫作"恶性循环"——制度松动→观念焦虑→内心退守→形式主义→管理者误判→追加制度→意义进一步流失。但"循环"这个词会误导人:循环意味着系统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,像四季轮回、像年年立志岁岁重蹈——它至少还是可逆的,转过一圈还在原地。而这里发生的不是这个。**这不是一个转回起点的环,而是一台只朝一个方向走的棘轮。**它松不回去,原因藏在一个很朴素的事实里:维持这套"假装的集体行动",是要烧钱的——烧的不是金钱,是每一个人心里那份"还愿意较真、还愿意多做一点"的蓄势之力。李老师每一次选择"把题型讲透就够了",都烧掉了一点原本可以点燃她的东西;而关键在于,**烧掉的这一点,收不回来。**下一轮她的起点,已经比上一轮更低。管理者每一次用"规范"去替代"看实质",也烧掉了一点他自己对"什么是好教育"的判断力,而且同样收不回来。

面对最有力的反驳

一个最有力的反驳来自教育现场最真实的焦虑:你说的"松动与硬化"或许成立,但它忽略了一个最坚硬的事实——在社会层面,教育的"筛选功能"依然在顽强运转。大学录取仍看分数,企业招聘仍看学历。对大多数普通家庭尤其是底层家庭,"考高分、拿文凭"依然是唯一看得见、抓得住的上升通道。你说教育失去了土壤,但那些每天逼孩子刷题的家长,脚下的土壤还结实得很。你的判断,可能是"精英视角"的误植。

本文的回应分三层,但每一层都不是为了"收编"这个反驳,而是为了更诚实地厘清:本文的判断在哪里成立,在哪里遇到边界。其一,筛选功能的顽强,恰恰是困境的症候而非反证——当知识传递的功能被技术瓦解后,学校之所以还能大规模运转,靠的正是那个残留的、甚至被加倍强化的筛选功能;学校的核心业务正在从"培育"滑向"认证",这本身就是"旧垄断松动、新垄断硬化"的最典型症状。其二,抓得更紧,是因为脚下的地面在晃——越是底层的家庭对"考分"抓得越死,不是因为确信这条路通,而是因为无路可选;只有当你脚下的地面开始晃时,你才会把栏杆抓得那么紧。其三,也是本文必须诚实标注的一个边界:在极端的资源匮乏下——那些从未真正拥有过"旧土壤稳定"的家庭——困境的形态可能不是"松动与硬化的往复",而是"无土可松"。那些孩子面对的不是"意义的焦虑"(焦虑至少预设了你有余裕去追问意义),而是"意义的不可能性"。对那个"直接被压碎"的极限状况,本文坦承尚未能充分处理,它不是本文框架可以轻易装下的——这个诚实的"不知道",可能比一个看似无所不包的理论推衍更负责任。

谁在裂缝处冒险

提出了"松动与硬化"的判断,是否意味着一切改变都不可能?本文的回答是:改变的可能不在于从外部搬来一套"理想方案",而在于从自锁结构内部,找出那些已经在发生的、虽然微弱但确实在

冒头的新形态。它们不是被谁"设计"出来破解困境的,而是在困境中挣扎出来的另类生存方式。近年在一些城市中产家庭的"教育出走"实践中,出现了脱离"只有分数能言说成长"的评价体系、用真实任务表现记录与答辩来认定学习的尝试;它们极其小众,面临巨大的制度风险,但它们的存在本身证明了那套被认为铁板一块的制度,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言说方式。而在系统内部,仍有一批教师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,为自己和学生保留了一小块"做真事"的空间:一个数学老师周末带几个学生读一本非教材的数学史,不考试、不算分,只因为那些孩子眼睛在发光;一个语文老师在学期最后一节课给学生读里尔克的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,读完什么也没讲,只说了句"你们以后会想起这封信的"。

这些实践当然脆弱——任何一次人事更迭、一次职业倦怠都可能让它们中断。它们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"失败",而是"被收编":如果主流系统吸收了这些实践的形式(比如也开设"项目式学习"),却把它们再度塞进旧的评价格子里(给"项目"也打分、也排名),那它们最初携带的那种野性的、想逃出分数牢笼的冲动,就可能被消毒、被驯化、被变成另一种更精致的筛选工具。但只要它们还在缝隙里活着,那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自锁结构,就还没有完全掌控一切。

一幅不工整、却更接近真实的地图

本文的判断排除了几种常见回应的有效性:单纯的技术升级会让学校的自主性进一步流失;单纯的人文呼吁会被悬空为无法落地的诗意;单纯的外部批判会耗尽教育内部行动者最后的心力。它们不是错的,它们是不够——它们都没看到那个"松动与硬化同步发生"的复杂运动,因此都无法同时处理两端的压力。

真正需要的,也许不是"对策"——这个词预设了我们可以站在困境外部、用一套理性方案去解决它。更有可能的情况是:改变的可能不在任何人的"方案"里,而在那些已经在旧结构裂缝处冒险的、微小的另类实践中。本文能做的,是诚实地画出当前的困境结构,并在裂缝处指出那些冒头的东西——它提供的或许不是一个答案,而是一幅比"三重地基松动"更不工整、但可能更接近此刻教育现场真实纹理的地图。